臺大歷史學報第 70 期
2022 年 12 月，頁 259-268

BIBLID1012-8514(2022)70pp.259-268
2021.12.22 收稿，2022.12.19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212_(70).0006

§書評§

工人階級為何失語：評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xii+302 pp.

師　義　帆*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社會學系教授安舟（Joel Andreas）長期關注中國的階級分化與社會不平等。他於 2009 年出版了第一部學術專著《紅色工程師的崛起》（*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以清華大學 1949 年以來的歷史為例，研究中國技術官僚群體和專家治國模式的興起。他認為，20 世紀 80 年代後「紅色工程師」這一結合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的新階級，逐漸登上中國政治舞臺，表明毛澤東時代（1949-1976）「拉平階級」（class leveling）的努力徹底失敗。[1]安舟繼而於 2019 年出版第二部學術專著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關注 1949 年至 21 世紀初期的中國工人和工廠政治。此書於 2021 年獲列文森圖書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中國近現代史組別）。

由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衰落日益明顯，

*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講師
200241 上海市閔行區東川路 500 號法商南樓 211；E-mail: ecnushiyifan@gmail.com

1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很多學者試圖通過不同路徑探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這些研究大體可分為兩種思路：一是認為毛澤東時代工人的實際地位並不如官方宣傳中那樣崇高，社會主義革命並未真正使工人階級得到解放，反而加劇工人對單位和單位領導的依附。[2]二是發掘毛澤東時代的積極因素，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工業管理模式實現了真正的「經濟民主」，甚至能夠為西方企業管理的弊端提供解決方案，暗示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改革造成了工人階級的邊緣化。[3]

安舟的著作徵引大量一手文獻，包括《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地方黨報、工廠廠報、大事記等官方出版物，也包括文化大革命時期工廠群眾組織自行印製的傳單、小報等非官方出版物。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大量採用口述史方法，共訪談 128 人，其中 121 人為工人或工廠幹部，7 人為「文革」期間幫助工人成立造反組織的學生領袖。這些訪談對象的年齡跨度大，地域分布廣，訪談內容涵蓋從 20 世紀 40 年代到 21 世紀初北京、鄭州、洛陽、秦皇島和武漢的工廠生活。文字材料和訪談材料相互補充，使作者得以貫通改革開放前後 30 年的歷史，為工人階級地位變化提供一個長時段的描述。

一

本書共分為九章，其中第一章和第九章分別為導論和結論。在第一章中，安舟闡述了「工業公民權」（industrial citizenship）這一概念，並將其作為統攝全書的分析工具。他首先將工業公民權理解為一個全球現

2 如 Andrew George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 如崔之元，〈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讀書》1996 年第 3 期（北京），頁 11-21。歷史學家高華對崔之元的論點提出批評，認為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只是毛澤東主觀意志的結果，與工人「經濟民主」無關。見高華，〈鞍鋼工人與「鞍鋼憲法」〉，收入氏著，《革命年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頁 235-243。

象。作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十年裡，全世界很多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廠都建立起穩定的長期就業制度。因此，這一歷史時期被經濟學家史坦丁（Guy Standing）稱為「工業公民權的時代」（era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頁 2）。安舟認為，這個概念恰如其分地抓住了這個時代的最基本特徵，即在工廠工作不僅能夠保障工人的經濟收益，還能夠為工人帶來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在「職場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理念的影響下，工人得以組織起來，參與工廠管理，進而和政黨結合，參與國家政治。

安舟發現，這種工業公民權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工廠中設計了工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制度；西歐國家則將勞工、雇主和政府機關整合在一起，共同處理勞資衝突、討論產業政策；日本建立以終身雇傭為特點的「年功序列」制度；美國雖然並未建立勞工、雇主和政府的三方協商機制，但也鼓勵雇主和工會進行集體談判（頁 3）。

「工業公民權的時代」在 20 世紀 70 年代達到巔峰。此後，新自由主義崛起，削弱了就業保障、工業公民權和職場民主等理念。在新自由主義敘事中，工業公民權被描述為對私人產權、開放勞動力市場和利潤導向型措施的侵犯。工業公民權在 20 世紀 80 年代倒退後，90 年代又繼續面臨毀滅性打擊，各國工人逐漸從能夠參與工廠事務的工業公民蛻變為單純的受雇傭者（頁 4-5）。

安舟將中國的單位制視為工業公民權的體現，並從兩個方面考察中國工業公民權的興衰：第一，工廠成員身分（workplace membership），即作為單位的一員，工人享有穩定的工作，並被組織起來參與工廠管理；第二，工人的自主權（autonomy）。這兩個要素的消長構成四種勞動關係：高程度的工廠成員身分和低程度的自主權結合，形成「家長制」（paternalism），即員工享受工廠無微不至的關懷，卻無法在公共事務上表達自己的意見；低程度的工廠成員身分和高程度的自主權結合，則形成類似軟體開發公司的「個人自主」（individual autonomy）；如果工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廠成員身分和自主權都處於低程度，則會形成「市場專制」（market despotism），比如一些高流動率的電子廠；只有高程度的工廠成員身分和高程度的自主權結合，才能形成真正的職場民主（頁 13-14）。安舟進而按照時間順序回顧了 1949 年以來中國工業公民權的發展歷史。他關心的問題是：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在工作場所享有公民權和自主權？這些權利在這一歷史時期內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又是什麼導致了這些變化？隨著這些權利的變化，工人有多大的權力來塑造他們的工作環境、參與工廠決策，並能夠追究工廠領導的責任（頁 10）？

二

安舟關於毛澤東時代工業公民權的描述，基本按照政治運動的歷史脈絡展開。第二章研究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發動的兩場和工業公民權有關的群眾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和整風運動。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新政權積極動員工人參與工廠事務，從而改變工廠內部原有的勞資關係；同時，工人獲得終身雇傭地位，以工作場所為基礎的福利體系逐漸完善。這些變革為工業公民權奠定基礎，但由於工人的自主權得不到保障，職場民主並未真正建立。在整風運動中，中共發動基層職工批評本單位的領導幹部，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的自主權得以體現。但是，整風很快轉變為反右，很多曾對工廠管理提出意見的人被打為右派，中華全國總工會也蛻變為中共控制工人的工具。反右運動所建立的，是一個強調工人參與、但拒絕工人自治的工業體系。

這個工業體系的基礎是單位制。在第三章，安舟描述毛澤東時代城市單位制的基本特徵。到 60 年代初，幾乎所有的城市人口都被納入單位。安舟將單位制的特徵描述為「一個強勢版本的工業公民權」（a strong version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或「參與式家長制」（participatory paternalism）（頁 53-54）。單位不僅是工作場所，也是休閒場所，工人在業餘時間被組織起來參加各種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單位制和 20

臺灣土地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盛行的家長式企業有相似之處。與此同時，中共鼓勵工人以職工代表大會的形式，高度參與工廠民主管理。安舟在這一章提供了幾則和職工代表大會相關的口述材料（頁 76-77）。雖然工人對這一時期職工代表大會的實際作用褒貶不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工人們幾乎沒有發表相反意見和獨立組織集體行動的空間。

第四章介紹 60 年代初的四清運動（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往關於四清運動的研究多聚焦於農村，但安舟發現，此運動在工廠同樣廣泛開展。作者認為，這場運動能夠發揮遏制幹部腐敗的效果，如武漢有數萬名幹部被撤職，全市 6.5%的黨員被開除黨籍（頁 97）。然而，派遣工作隊、自上而下發動群眾的作法卻強化了官僚主義，因為基層職工必須按照工作隊的指示批評工廠領導。如果職工的自主權超出工作隊所允許的範圍，就會受到處罰。安舟訪談了一位郭姓技術員，據他回憶，工廠四清工作隊要求他檢查車間裡一些技術幹部的私人信件。郭氏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不經許可閱讀他人信件是不道德的。隨後，四清工作隊領導就命令他停職接受調查，並批判他背叛了工人階級出身（頁 91）。

第五章和第六章討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工人政治。安舟認為，「文革」初期的造反運動成功確立了工人的自主權，因為在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工人得以自下而上成立自己的組織、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一觀點與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李遜對工人造反派「經濟主義」訴求的研究不謀而合。[4]但安舟同時強調，通過「大民主」方式確立的工人自主權未能制度化，因為工人們只能在有限的議題空間內批判幹部的腐敗、特權和官僚主義，不能要求提高自己的福利待遇；另外，造反組織只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獲准存在。1967 年至 1968 年，各地開始成立軍代表、工人代表和老幹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造反組織不再活動。但是，在工廠，革命委員會並未真正成為工人行使自主權的載體，而是陷入「休眠」（dormant）（頁 160）。

4 見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

安舟對中國工業公民權的研究並未止於毛澤東時代，而是一直向下延伸，這種作法頗符合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界「打通 1978 年界限」的趨勢。第七章和第八章考察了 20 世紀 70 年代末至 21 世紀初中國工人工業公民權的巨大變化。改革開放初期，雖然市場的作用日益突出，但單位制的基本特徵（即公有制和終身雇傭）仍然得以保留，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得到加強。比如，工廠修建更多的宿舍、食堂、學校、托兒所和休閒娛樂設施，以滿足單位職工的生活需求；職工的配偶、子女也被安排在這些機構中工作。因此，單位繼續發揮「小社會」（small societies）的作用，自給自足，並負責職工的就業和福利（頁 191）。

安舟發現，80 年代前半期可謂職場民主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共要求工廠恢復和加強職工代表大會的作用，由於工人此時仍然享有「鐵飯碗」，不必擔心被解雇，他們可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在工廠事務中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與「文革」中的「大民主」相比，職工代表大會是一種實現職場民主的制度化嘗試。雖然工人參與工廠內部事務的空間仍然十分有限，但他們可以在工資、獎金、住房、子女就業等關乎自身利益的重要經濟問題上，與工廠領導進行激烈爭論。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一些工人開始變為合同工；同時，在工廠內部，由於強調廠長負責制，工人與領導之間的權力關係出現了微妙的變化，職工代表大會的作用被削弱。進入 90 年代，工人自主權進一步式微。在市場化改革浪潮的衝擊下，1994 年的《公司法》和 1995 年的《勞動法》要求單位「公司化」，並廢除了工人的「鐵飯碗」，工人喪失了工廠成員身分，也喪失了自主權，徹底淪為失語者。一位 1981 年進入重慶鋼鐵廠工作的工人，在接受安舟訪談時說：

> 我剛進廠的時候，工人可以說話，我們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這種情況到 80 年代末就改變了。從那之後，整個制度變成了廠長負責制。在車間和班組也是一樣——一個人說的算。他說什麼都是對的，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 工人不能說話（頁 188）。

儘管職工代表大會仍然舉行，但在利潤導向的壓力下，很多工人已經不再關心工廠事務，工廠領導也不認為工人有能力參與工廠事務。一位副廠長兼工會主席說：

> 普通工人不瞭解企業，……尤其是合同工，他們基本上對公司的情況一無所知。他們的腦子也不想那麼多，他們就是來上班，幹活、掙錢。普通工人也不能很好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他們和我們不一樣。我們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我們更瞭解情況（頁 210）。

四

安舟曾被中國學者董國強歸類為美國「新左派」學人之一。[5]但是，安舟和許多「新左派」學者的最大區別，在於他並不認為毛澤東時代的激進社會實驗是成功的。正如他在前言中自述，本書和上一部專著一樣，試圖回答一個重要問題，即「20 世紀共產主義消除階級差別的工程為什麼失敗了」（頁 vii）。在筆者看來，本書最突出的優點，恰恰在於作者的論點打破了「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時期」的二分法。作者認為 80 年代初期中國工人工業公民權曾經歷過一個短暫的黃金時期，而毛澤東時代高度集中的工業管理體制和 1992 年以來以利潤為導向的市場化改革，都不能帶來職場民主。這提醒改革開放史研究者注意 80 年代改革的與眾不同之處，也讓人們思考在目前中國官方「經濟上引進外資、政治上堅持中共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敘事之外，是否還曾有過其他改革路徑。

5 見董國強，〈新中國階級關係的解構與重建——讀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文化大革命與中國新階級的起源》〉，《記憶》總第 60 期（2010 年 10 月），頁 36；電子版見 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REMEMBRANCE-No-60-2010 年 10 月 20 日.pdf.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本書的第二個優點，在於作者使用「參與式家長制」這一概念描述毛澤東時代的單位制。這個概念既能夠體現中共政權對基層自上而下的控制，同時也能夠體現普通工人在這一體制下擁有某種程度的能動性。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決定了中共領導下的政權必然要求群眾參與，毛澤東本人亦偏愛「轟轟烈烈」，而不欣賞「冷冷清清」。[6]在此過程中，基層群眾未必都是在壓力之下被迫參與；相反，他們能夠在政權所允許的範圍內找到生活的意義。筆者在研究毛澤東時代至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共群眾文化工作時，也在訪談中感受到，安舟所言的「集體主義倫理」（collectivist ethics）（頁 53）在一定範圍內是真實存在的。這樣的研究思路，有助於打破對極權主義政權下普通民眾「壓迫—反抗」的二元敘述模式。[7]

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本書同樣存在兩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第一，作者有時似乎延續了越南戰爭以來西方左派對毛澤東時代的諸多浪漫想像。[8]其實，安舟的經歷體現了一個典型美國左翼青年的人生軌

6 如毛澤東 1958 年在成都會議上說：「我們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見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三）〉（1958 年 3 月 20 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4-014.htm.

7 基於類似的思路，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在她關於東德民眾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中提出了「參與式獨裁」（participatory dictatorship）的理論模型。如她所言，對大部分普通人來說，生活在東德並非意味著「壓迫」或「反抗」，儘管東德政權是一個高度「干涉主義」（interventionist）的政權，但人們的生活相當「正常」。見 Mary Fulbrook, *The People's State: East German Society from Hitler to Honec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8-11.

8 比如，受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越南戰爭的影響，美國學者塞爾登（Mark Selden）在其 1972 年出版的專著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中，提出著名的「延安道路」命題，認為中共在陝甘寧邊區通過統一戰線、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幹部下鄉、基層普選等措施，成功建立一個有群眾廣泛參與的高效行政系統，為中共日後成功奪取全國政權奠定基礎。但在 1995 年出版的修訂版中，塞爾登承認，儘管他的中心論點仍然正確，但「延安道路」忽視了中共體制中「壓迫和倒退的傾向」（repressive and regressive tendencies）。見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M. E. Sharpe, 1995). 對很多美國左派學者和觀察家來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充滿吸引力，因

跡。早在 70 年代，安舟就出版過一本關於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 family）的非官方繪本傳記 *The Incredible Rocky*，[9]那時他還是一名中學生。在這個繪本中，安舟以生動細膩的筆觸諷刺美國大資本家與政界的勾連。可以說，早在成為學者之前，安舟就已經是一位活躍的左翼活動家。在母親的鼓勵下，安舟很早就投身反越戰運動。據他弟弟回憶，60 年代末，安舟曾在學校拒絕向美國國旗宣誓效忠，還要求將學校改名為「安吉拉．戴維斯初中」（Angela Davis Junior High），以向這位黑人民權運動家和美國共產黨領導人致敬。他還曾在學校組織關於越戰的辯論和學生反戰遊行，甚至在夜間去曾就讀的小學升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幟。[10]

也許是由於這種左翼底色，作者的一些表述尚存在斟酌餘地。比如，安舟認為，四清運動是文化大革命前「動員基層群眾監督幹部」的「最廣泛、最深入、最持久的努力」（the broadest, deepest, and most protracted effort yet to mobilize supervision of cadres from below）（頁 82）。在這裡，他將四清運動視為一場反對幹部腐敗的群眾性運動，但正如作者在書中引用的訪談材料所反映的（頁 91），基層工人在四清運動中被要求批判那些工作隊認為「有問題」的工廠領導，實際上也是為了服從工作隊領導的意志，工人並無自主決定批判對象的權力。將這樣的運動定性為「群眾監督」（mass supervision）的實踐，有前後矛盾之感。

第二，出於對市場的警惕，作者在描述 1992 年以來的改革時，過分強調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下的全球「市場專制」轉向，而忽略中國的特

為它提供了不同於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另一種發展模式。見 Fabio Lanza, *The End of Concern: Maoist China, Activism, and Asian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9 Joel Andreas, *The Incredible Rocky vs.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Featuring America's Richest Family* (Berkeley: North American Congress on Latin America, 1973); 電子版見 http://www.crowhealingnetwork.net/pdf/The%20Incredible%20Rocky%20by%20Joel%20Andreas%20(c)1973.pdf.

10 關於安舟及其家庭的歷史，見其弟 Peter Andreas 的回憶錄：Peter Andreas, *Rebel Mother: My Childhood Chasing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7).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殊性：中國共產黨始終在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安舟試圖將中國工人階級地位低落，納入全世界範圍內工業公民權不斷下降的歷程中。但和其他國家不同，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始終保留列寧主義體制。[11]作者書中的案例研究也表明，自 50 年代以來，邊緣化中華全國總工會、並持續禁止工人自發結社的，不是市場，而是中國共產黨，即便在 80 年代初的「黃金時期」也是如此。因此，作者未能妥善處理「市場專制」和「黨專制」的關係。當然，由於中國目前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混合模式，如何在評估改革得失時有效區分市場和非市場因素的作用，這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吳昌峻　陳冠輔）

11 陳峰，《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制度、衝突與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